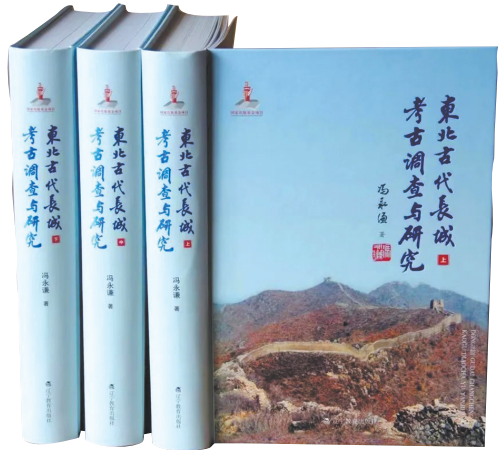


## 耕耘七十载 硕果累累

《东北古代长城考古调查与研究》读后 齐心



在这部专著中,过去不知而新发现的长城甚多且内涵更加丰富,现简略介绍几点。战国燕和秦、汉长城,最早发现已有八九十年,但线路比较单一,只在赤峰发现一道,而且也只调查过一段。古代长城的发现,是近些年来来的考古工作开展才开始丰富起来的,如在河北承德、内蒙古赤峰、辽宁建平地区,从南至北不同距离发现并列的三道长城,它们究系何代?一般论著皆以南边一道为汉,中间一道为战国燕、北边一道为秦始皇修筑。这些地方的长城作者均现场调查过,根据长城所在地域,尤其是在附近发现的遗址、城址、墓葬及相关出土遗物的年代,作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南边一道长城,为后汉长城,其后为西晋与北齐沿用,经历了三个时期,而北齐长城至海,应在经过今朝阳后,南折至今锦州南面的海边;中间一道长城,为战国燕时秦开却胡后所修筑的长城,其后至汉武帝时“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史记》)语,因北边弃地予胡,辖境内缩,原相应地段的长城亦废弃,还回后的南面一道长城被利用,即燕北内长城;最北面的一道长城,因在其内侧发现有战国燕及秦等时代的遗址、墓葬和相关文物,由此可知此道长城为燕国强盛时辖境北拓所筑的燕北外长城,亦为秦统一六国后联结北边秦、赵、燕三国长城后的秦“万里长城”所沿用,但秦短祚,又为汉承秦制的前汉初年所沿用。同时,冯永谦还认为燕北两道长城分布在赤峰南北两面,过去被称为“赤南长城”和“赤北长城”不妥,因其长城在今赤峰东西两边均延长很远,如果各地均以本地地点命名,必产生混乱。故此,他提出这两道长城应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分别叫做“燕北内长城”和“燕北外长城”,这样既明确又简便,现在此定名已为学术界所接受。

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过去文献记载很少,如《史记》说“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只用

冯永谦先生著《东北古代长城考古调查与研究》是一部全面介绍东北地区长城的专著,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全书16开本,上中下三册,64万字,包含长城考古调查照片1900多幅、长城走向分布地图30余幅。读过该书后,感到这是一部学术厚重、内容丰富、考证详尽的长城考古调查与研究著作,既有重要学术价值,更助力长城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作者冯永谦先生今年九十岁,二十岁起就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至今已七十多年。在这漫长的长城考古调查与研究著作,既有重要学术价值,更助力长城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令人耳目一新。

《东北古代长城考古调查与研究》从开始调查到如今专著出版,历经近七十年的时间,调查各地长城时间先后不同,但在完成此书时,却将其进行归纳,按历史朝代依次编排叙述,条理清晰,一目了然。东北地区古代长城,经过冯永谦调查考证,在不同地理位置上修筑的长城,有十八个不同历史时期,起自战国燕(经其命名有燕北内长城、燕北外长城),止于明代,历时两千多年,包括秦、汉(经其考证有前汉初年长城、汉武帝长城、后汉长城)、西晋、前燕、北齐、北周、高句丽、渤海、辽、金(经其厘定有岭南长城、岭北长城)、东夏等各朝代在其所管辖的范围修筑的长城。从这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很多民族都曾修筑过长城,如汉族政权修筑长城的,有战国燕、秦、汉、西晋、明,其他民族政权修筑长城的,有鲜卑族前燕、受鲜卑族东魏的北齐、鲜卑族北周、高句丽族高句丽、靺鞨族渤海、契丹族辽、女真族金、女真族东夏。可以看到,长城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并非只是单纯的以军事防御为目的的工程设施,它实际起到的作用,是以长城为纽带,拉近了民族间的距离,实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

程存洁先生著《空谷足音——敦复书室信札整理与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程书”)已藏事,将清样交给我,托为通读并写点意见。对于朋友找我读他们的未刊论著,我历来乐于接受,因为我觉得朋友找我,是对我的信任;其次,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读后无疑会增加知识、开阔视野;第三,一个人不论是否名家,他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谁也做不到“文不加点”,切磋学问,便是互相讨论,互相帮扶。但是,当我翻阅这近八百页书稿清样的时候,深感自己的应承有些草率。我对罗原觉其人其事知之不多,从目录上经眼所及,书中所收入人物太多,范围太广,以本人所见所知,实不足以言作序。但已答应,自不能食言,只好勉从事了。

当代广东文史界,对罗原觉的名字比较陌生。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便定居香港,60年代中期去世了。前些年,广东曾有学者撰文介绍罗原觉,认为其“岭南碑帖第一人”,他对古字画、石刻拓本、碑和碑帖、金石、砖瓦、木刻字、古印章、印谱,乃至玉石、陶瓷、造像、端砚等,无不极力搜集,并加以研究。梁启超曾在致友人信中说:“友人罗原觉,精鉴别,所藏颇有尤物。”便是有感而发。及定居香港,经中山大学商承祚教授介绍与联系,罗原觉及其家属相继将所藏部分友朋函札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收藏。平实地说,在20世纪上半叶,罗原觉是岭南地区屈指可数的文博学者。这种判断,可从这本书的内容得到证实。

有关程书的编著过程,在本书《自序》中已经说得清楚,从立意到成书,已历三十年。当他接触到罗氏的资料后,先是系统收集和整理罗氏已刊和未刊著述文稿,整理捐赠品中的碑拓、书画等各品类文物,对岭南这位文物鉴赏家、学者的专长和学识,逐渐加深了认识,做到“知人”这一步。其次,是整理和研究罗氏所藏亲友往来信札,这就是“知交”——知其所交游。在此整理过程中,按人头将来往信札加以研究,先后撰成七十余篇论文,其中部分信札是罗氏所藏而非其本人直接与亲友的往来信件,因为内文有关文博行业之事,一并加以收存研究。

在程书中,经著者考实的信札作者,既有粤港澳地区的,也有京津沪等地乃至国外的;既有一般文坛界的友人,也有名声显著的学者、官员等各式人物,关于这类人,可列一长名单,如王国维、黄节、蔡宗、丁文江、周季木、朱师辙、朱希祖、汪兆铭、张元济、邓实、陈少白、李仙根、邹鲁、韩树园、陈融、沈曾植、马衡、黄宾虹、关冕钧、王秋涓、梁启勋、熊闰同、温廷敬、李沧

## 《空谷足音》敦复书室信札整理与研究》序

李吉奎



萍、李韶清、古直、姜忠奎、黄居素、胡毅生、陈宗孟、曾传昭、钟介民、徐新六、袁柳淮、陈海、罗惺融、罗惺曼、罗君美、易大厂、龙泽厚、李次武、谭璋青、徐良、陈熙橡、陈承修、江天铎以及日本的大野毅、原田淑人等人。要弄清楚这六七十位信札作者的情况及与罗氏的关系,并撰文介绍,绝非易事,但存洁先生做到了,条分缕析,解说清楚,各篇文章,都值得一读。

在罗氏这批友朋中,黄节是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因为黄的关系,黄的学生丰顺李沧萍、女婿李韶清(沧萍之弟)也成为罗氏的友文。程书所收《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创始人黄节与罗原觉交往简述》即记其事。据载,罗氏的“敦复书室”是1925年由黄节起名并刻匾的。黄罗通函保存下来的达二十封之多。199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由欧初先生撰写《前言》的《蕪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其中收录了己巳年(1929)写的《濠镜寄广州罗原觉》一诗。另外,黄节壬寅年(1932)写的《我诗》:“亡国哀音怨有思,我诗如此殆天为。欲穷世事传他日,难写民间尽短诗。困苦蓼虫惟不徙,食肥芦雁得无危?伤心群贼谋经国,孰谓诗能见我悲。”该书《前言》中说,黄文宽先生生前曾对作者欧谓:“晦公逝后翌年,于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仰忠街口吉祥茶楼举行纪念活动,展出晦公诗书作品,中有折扇书赠罗原觉《我诗》,因有所忌讳,展出时折盖“伤心群贼”等二句。”此诗写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形势岌岌,国家危亡即在眼前,黄为罗氏题此诗,足见彼此皆有同感,且系可以推心置腹之人。可惜,次年黄节便去世了,罗氏也从此失去了这位师友、同道与知音。

程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整理信札时,对各函件加以标点、释文,并相应撰文考订史事,或旁及其他事项。同时,尽可能地记述信札的保存现状等信息,从而拓展信函的学术空间,并通过对信札的解读,力求发掘书写者的学术业绩、

十一个,就写了几千里长城。因此过去不知长城在什么地方,甚至有人认为燕长城修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城下。实际经过考古调查发现,长城经过辽西郡到辽东郡,都是在郡的北边就地修筑的,在今赤峰、建平、敖汉、北票、阜新、彰武、法库、开原、铁岭、抚顺、本溪、凤城、宽甸等地。这些地点,作者都曾前往调查过,并拍下了大量的遗迹照片,在本书中均有反映,非常难得。

尤其是那些过去没有记载,或仅有只言片语却不知今在何处的长城,都经过作者的调查而被辨别出来。前者如前燕慕容就在现今宾修筑的长城,后者的时期较多,如北齐经朝阳而至海的长城,北周在今绥中经墙子里到止锚湾长城,高句丽在今四平、昌图、沈阳和营口的千里长城,辽代在今大连的镇东海口长城等。

在东北古代长城研究中,金代长城是个短板。首先是在沙漠草原最北边呼伦贝尔发现一道长城,过去定为“成吉思汗长城”“金源边堡”“拓拔鲜卑国界”“汉光禄城”“辽代防御工程”等,冯永谦确定为金代长城,并定名为金代的“岭北长城”。金代岭南长城较为复杂,线路多道,冯永谦也均为其定名。另外,对金代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的定名问题,作者也进行了考辨。被称为“界壕”的金代军事防御工程与“长城”相似,金代对“长城”的称谓有十多种,并不是只有“界壕”一词,其他称呼有多条,而“界壕”一词在《金史》中只见两次,并不典型,如称“壕堑”者最多,其他名称亦有,而“界壕”并不具有代表性,为何要用“界壕”称之?再看历史沿革,秦代称“城堑”,汉代称“塞”或“塞垣”、北史称“长垣”、明代叫“边墙”,这些时代的军事防御工程设施都不称其为“长城”,我们今天却一律叫它为“长城”,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唯独对金代的这种军事防御工程,不称“长城”而一定认为是“界壕”呢?冯永谦对此极为为之考辨,认为金代所筑的是“长城”,不能再另外确定一种名称。

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长城,过去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竟有这么多时期筑有长城,并有这么多民族参与修筑,读过《东北古代长城考古调查与研究》后,才知道东北古代长城分布如此密集,内涵如此丰富,对深入了解和研究长城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 《东北古代长城考古调查与研究》

作者:冯永谦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学术交往及其性格情趣等历史信息。如程书收录的《新发现王国维书信考释——兼论晚清民国广东周青铜器的收藏及与湖南的渊源关系》《从新见信函谈粤籍学人汪兆铭与罗原觉的学术交往》《新发现蔡哲夫遗函考释》《陈少白的书画情》《丁文江的人格魅力》《班马传家作史官——读经史小学名家朱师辙的一封信》《函书结缘——读张元济写给罗原觉的第二封信》《人粤为寻绍武来——朱希祖的一封信》《马衡先生鉴定文物的一张便笺》《寻常一物关兴废——从李仙根遗函所获文物收藏启示》《罗原觉日本之行考略》等内容,就是以罗原觉往来信函为中心,谈及更为广阔的学人学术交流活动。通过研究,揭示了民国时期一些南北学人鲜为人知的资讯,拓展了民国史研究资料范围。

晚清以降,文物出土渐多,文物交易日盛,而且日本欧美西方列强大肆盗窃、掠夺,加速了文物的流转。通过程书所收函札的内容,可以说,罗原觉也是一名文化商人。在文物出土、流转与整理、研究中起桥梁作用,他确是将自己藏品中的“尤物”,挑出其中部分转手,进行交易。当然,他也对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有其藏品水平,否则,便不会有众多海内名家与之来往了。

存洁先生在编著这部书稿时,因为所收各该信函的作者有的是名家,其经历与著述不难看到;有的是名不见经传而又具有学术可观的普通文博界人士,故在标点、释文后进行相应研究时,便不能不定一个原则,用他的话说,是秉持“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在文中加以体现,在此过程中,自然也就展现出他的学术心得与学术成果,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风格。书中所收信札,从时间上说,有的几近百年,保存不毁,陈年漫漶或破损,个别信札有字迹难以辨认者,编著者虽然努力将事,或求教通人,可能仍有失当之处,相信读者会不吝指正。

函札、书信,旧称尺牍。“付诸洪乔”故事,相传已近一千六百年。此通信手段原为我国所固有,渐积而传诸四裔汉文化圈者。然而,民国以后,此具程式之技,日见式微,致有某校学生不能书一函者。盖尺牍以文字为载体,文以载道,字为书法,书画并称,名家之作,在文化范围为艺术品。尺牍不昌,自难有书法之可究,书艺亦趋淡化。程书所收各家函札,属名家之品者,叙事为历史资料,书法则洵属珍品。程书刊世后,闲暇无事,随手翻阅,当会心旷神怡,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空谷足音——敦复书室信札整理与研究》的出版,是岭南文博界的一宗盛事,可喜可贺。承蒙存洁先生厚意,使我有幸先睹为快,读后受益良多。以上,拉杂写了一些粗浅的随笔,以报存洁先生,并乘此机会诚恳地向读者推荐。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 《空谷足音——敦复书室信札整理与研究》

作者:程存洁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2月

## 考古学的叙事方式与理论发展

考古学不像人类学那样可以直接在田野中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它面对的是以碎片化呈现的物质遗存,因而,需要以考古学独有的方式对资料做出描述与阐释。当考古学描述与阐释落到纸面上以语言方式呈现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考古学独有的叙事方式,即考古学叙事。

现代考古学自19世纪中叶确立以来,一直在追求一种对人类过去的客观、全面的理解。对客观理解的追求促使了各种理论模式的诞生。于是,我们看到了20世纪初出现的以认定“文化”(culture)和“集团”(group)为目标的文化历史学派,也看到了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以系统分析为特征的、具有强烈功能主义色彩的进程主义考古学,以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历史和文化阐释为特征的、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进程主义考古学。

进程主义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就直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考古学的性质究竟是描述还是解释?也就是说,考古学的任务究竟是要单纯地重建过去和复原古人的生活场景还是要解释古代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马修·约翰森(Matthew Johnson)认为,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是描述式的,擅长描述文化发展的时期与区域。因而,文化历史学派的考古学叙事就像是用事件串连起来的“编年史”。在进程主义者看来,考古学显然并非以复原文化历史为终极目的,而是借鉴科学哲学,提出假想,构建模型,从文化进程的角度来推演社会系统的变迁。后进程主义同样强调阐释的重要性,然而,它拒绝进化主义孜孜以求的“通则”,鼓励多元化的阐释方式;受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实践理论的启发,强调个体能动性以及人类实践所形成的“惯习”对社会结构的形塑。

方法与理论模式的不同自然导致了考古学叙事方式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 1892—1957)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中如何以区域划分方式对地中海、波罗的海、阿尔卑斯山、多瑙河流域等各地区考古资料进行描述、组织、分析和阐释。后来,我们还会看到宾福德(Lewis Binford, 1931—2011)在《追寻人类的过去》中如何将阐释的焦点放在考古学材料的形成上,如何基于他的“中程理论”和民族考古学方法来阐释人类行为对环境的适应性关系,狩猎群体的流动性与遗址形态的关系,以及农业定居社会形成的动因。从柴尔德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概念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关系以及器物类型与物质文化之间的时空关系,族属与物质文化呈现出某种对应关系。从宾福德的叙事中,我们则看到了一些科学概念的出现,比如埋藏学、文化系统、土地利用、遗址废弃过程、人口增长等。如果将柴尔德的书写称为“历史式叙事”,或许我们可以将宾福德的进程主义书写称为“科学叙事”。

## 人类学对考古学的影响与本体论转向

对考古学理论建构影响最大的学科非人类学莫属。文化历史学派正是以人类学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为基础而得以构建。瑞典考古学家蒙特利乌斯(Oscar Montelius, 1843—1921)的类型学方法代表了人类学进化论模式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而宾福德在其宣言式论文《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更是直接将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理论目标合二为一,强调考古学的人类学性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正是人类学的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在考古学理论中大放异彩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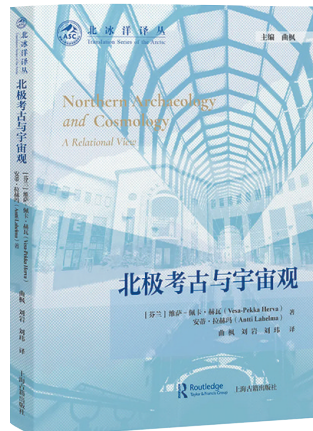
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人类学本体论转向思潮兴起。以拉图尔(Bruno Latour, 1947—2022)、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维韦洛斯特、德·卡斯蒂罗(Viveiros de Castro)、英戈尔德(Tim Ingold)等人为代表的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解构启蒙主义时代确立的文化与自然之二分法,挑战长久以来在人文社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依据非西方原住民的本体论宇宙观,本体论人类学认为社会性不仅仅是人类的自身属性,还是非人动物、植物、事物、景观的共有属性。也就是说,非人生命与人类共享同一文化与社会。因而,人类与非人生命一样构成了一种平等、互惠的网络式关系。受启于本体论人类学理论,关系考古学(relational archaeology)兴起。考古学家不再像以往那样将动物、植物以及事物视为人类消费的物资来源,而是将它们视为同一社会中具有生命、情感与意志的行为者,与人类共同创造文化和历史。一项有趣的研究来自英国考古学家康奈尔(Chantal Conneller),通过对一件出土于中石器时代地层的鹿角饰物的语境分析,她提出,这件鹿角饰物并非简单的面具,而是一种超越了人与动物之间界限的灵性物。戴上鹿角面具代表着人向动物属性的转换,从而可以具有鹿的品质与特征,体现了人与动物主体间关系的双向流动性。挪威考古学家阿姆斯特朗·欧玛(Kristin Armstrong Oma)通过对挪威南部青铜时代农场长屋(longhouse)遗址的考察,认为人类与牧养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互信的、互惠的和亲昵的,并进一步提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概念。

## 《北极考古与宇宙观》的全景式叙事与研究视角

赫瓦教授与拉赫玛教授有关芬诺斯坎底

## 考古学的另类叙事——《北极考古与宇宙观》译序

曲枫



亚地区(包括芬兰、瑞典、挪威及俄罗斯卡累利阿共和国与科拉半岛)的考古学专著《北极考古与宇宙观》正是在本体论转向的背景下完成的。它不仅完全采用了关系考古学理论视角,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全新的全景式整体论叙事方式。首先,它并不遵循传统考古学的分类模式,从文化现象出发,按考古学发现的聚落、房屋、墓葬、器物、精神文化遗迹或遗址、环境等依次描述并阐释。这一传统的叙事方式显然是传统自然与文化或者物质与精神等二元对立观念的体现。受北极传统民族萨满主义宇宙观的启发,作者以北极萨满信仰的三层世界宇宙观为模板,将全书分为陆地、海洋和天空三大部分,每一部分按自然现象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化景观来分类并依次叙述。陆地部分的叙事框架由石头、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房屋)、森林三节组成。海洋部分分为海洋景观、航道(以及航道上的船只)、河口三节。天空部分则由鸟和太阳两种与先民宇宙观密切相关现象构成。其次,专著展现了令人吃惊的时间深度,时间跨度超越7000年,起自新石器时代早期,直至现代。更为重要的是,该作打破了传统编年史的线性时间秩序,采用一种非线性时间视角,即对时间的“错置”来建构其叙事框架,因而使历史、文化、神话、社会、人与非人生命的日常生活以一种非历史主义方式形成了重叠式组合。实际上,北极传统的泛灵论信仰与萨满仪式实践早已清晰表明,不同世界与时间范围既可能重合,也可能错置,时间并非意味着过去与现代无法同时存在。

地处北极地区的芬诺斯坎底亚在地理上处于欧洲的边缘,但它并非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只是鲜为人知而已。赫瓦与拉赫玛在他们的专著中,将这一鲜为人知的地区放置于更为广阔的欧亚大陆及北极的背景之中,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边缘地区实质上一直与世界中心保持着内在的联系。

当自然科学家首次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它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因为它涉及大气、海洋、地层与生态系统的变化。然而,当我们紧接着认识到这些变化是因为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同时,这些地质的变化又将以不可逆的方式冲击人类的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时,我们会很快警醒地认识到,它在本质上更是一个人文概念。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发生了重叠与纠缠,自然、环境、生态在人类社会的框架中早已成为文化与社会中的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说,自然即人文。挪威人类学家阿恩·内斯(Arne Naess, 1912—2009)提出的“深度生态学”概念即强调自然的人文价值。该作正是在自然即文化这样的深度生态理念中展开叙事的。在书中,我们会看到,自古以来采矿工业本质上意味着人类与地下神力的交流;陶器制作意味着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互动式关系;在很多岩画作品中,正如康奈尔所论证的那样,人与鹿的身体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堆石建筑创造了一个融合不同时空与意义的空间;河口往往成为地域的中心,同时也是不同世界临界的空间;人类与鸟类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猎人与猎物那样简单,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本体论内涵。

## 跨学科研究与《北极考古与宇宙观》的学术贡献

该作的整体论特征还表现在它的跨学科研究模式上。它立足于考古学资料,结合芬兰神话学和民俗学传统,同时也吸纳历史学和民族志学的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整体叙事风格。

1986年,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马库斯(George E. Marcus)主编的人类学划时代名著《写文化》出版。该作对传统的科学民族志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其焦点即表述问题。传统民族志以客观性与科学性为目标,追求叙事真实。然而,在“写文化”人类学看来,追求叙事真实的民族志写作仍然是想象性的结果。因而,人类学的“写文化”没有必要排斥想象力与虚构。虽然“写文化”思潮对整个学术界形成了巨大冲击,但在考古学领域却鲜有人提到“考古学如何写文化”这样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传统考古学也面临着与科学民族志同样的问题,即考古学的客观描述与科学范式是否可以通向历史真实?考古学的“写文化”是否需要想象力与虚构?《北极考古与宇宙观》显然向我们传达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它所采取的不同以往的书写范式体现了重构考古学文化表述的必要性。

## 《北极考古与宇宙观》

作者:[芬兰]维萨·佩卡·赫瓦、安蒂·拉赫玛

译者:曲枫 刘岩 刘玮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